



日藏佛教典籍叢刊

法華五百問論校

上

◎釋真定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藏佛教典籍叢刊

法華五百問論校釋

釋真定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法華五百問論校釋/釋真定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8

(日藏佛教典籍叢刊)

ISBN 978 - 7 - 5325 - 5188 - 0

I. ①法… II. ①釋… III. ①大乘—佛經—研究②《法華五百問論》—注釋 IV. ①B942.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51466 號

日藏佛教典籍叢刊

### 法華五百問論校釋

(全二冊)

釋真定 撰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惠頓實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24.375 插頁 6 字數 433,0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300

ISBN 978 - 7 - 5325 - 5188 - 0

B · 786 定價: 7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 序

本書作者真定法師（吳鴻燕博士）於駒澤大學（原名：曹洞宗大學）研究生院攻讀碩士與博士學位，在敝人所設課程中鑽研中國天台學，於二〇〇三年三月以《法華五百問論の研究》一書（二〇〇七年出版於東京山喜房佛書林），取得佛教學博士學位。

《五百問論》之核心課題，主要環繞玄奘新譯所帶來對天台教學之衝擊而展開，是中彙集天台、法相兩派義學種種相違以及議論焦點。然而，此論一直未受學界關注，作者抽絲剝繭，突破諸多難題，直切核心，解明爾來諸多不明疑點，對唐代天台學提出種種新知新見，並公諸學會，是中成果功不可沒。

日本平安時代以來，一直無法確定《五百問論》是否為湛然真撰，作者以追究真偽說形成之原委為緒端展開考察，通過歷史過程之解明而畢其始末。而真偽說癥結所在，實乃發端於中國史料之缺如所致，史料的缺載，除了後世天台僧並未重視唯識法相學是為一大遠因以外，在中國散逸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受唐武宗會昌五年（八四五）的廢佛事件之影響。而《五百問論》恰是會昌廢佛發生的兩年前（八四三），由遣唐僧圓載託其從僧仁好傳入日本，並一直被保留於敝邦。此項史實的解明，對於學界當為一大重要成果。

本論題名「五百」，但實際問條數僅三九八條。針對此一問題，作者曾闢以專節鑽考湛然陳述自說

見解的「今謂」條數計達七一七條等文（詳參本書第一頁注一），今經作者嚴密核校，實際檢出更多脫漏現象。論中之「今謂」與「又云」，是為區分湛然與窺基二師之見的重要標記，但或脫或略獨甚，今經作者精密再校，此等脫漏問題一一浮現，並以小標字全面補足，使得二師之見可以了然分明，實為有志鑽研天台或法相學者提供了最佳讀本。

本書之公刊包含兩項重大意義：第一，是為撰者湛然歿後第一本中文注釋書；第二，是《五百問論》在中國佚失一千二百年後，首次以校本形式公刊於中國。

另，本書採《五百問論》唯一日文箋注——江戶時代日僧本純《五百問論箋註》為底本，全面逐字校核諸本，徵引出處，並詳密地進行標點、分段等。本論文本近十二萬字，作者施注二十萬言以上，並施予「解題」、「版本考記」等，全面展現《五百問論》全貌，功不唐捐。

作者並從本純箋注中洞見「從《問論》引文見出《玄贊》古本形態，知現行《玄贊》版本是為經修治的再治本。作為復原《玄贊》古本原貌者，《問論》應是重要考核與參考對象」。提供學界對於《玄贊》版本學新的研究指針。又，日僧圓珍《法華論記》更保留了《五百問論》的最初形態，此一最新研究成果，頗值得學界留意（詳參本書後附《問論》版本考記）。

本書之公刊，總結了作者學位論文既有之成果，以及注釋考訂後最新之研究進展。臨此刊行嘉際，敝人忝為作者指導教授，草書一序，止於片端，而本書此外諸多新說，還待讀者高賢明鑒。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池田魯參 識

## 解題

### 一、《問論》與《玄贊》

《法華五百問論》（以下略稱《問論》）為唐代天台僧湛然，對破法相宗窺基《法華玄贊》（以下略稱《玄贊》）之著作。法相教學是智顛（五三八～五九七）、灌頂（五六一～六三二）人寂後所成之宗派。該宗集大成者窺基（六三二～六八二）人寂後的二十九年，湛然（七一～七八二）才誕生。因此，從天台教學的立場，最先關注窺基法相教學的便是湛然。

湛然在世的時代不僅是中國佛教之黃金時期，也是中國佛教思想史上一大變革期和轉換期。所謂的變革，其要因之一，便是玄奘三藏（六〇〇～六六四）所傳來的新譯經論對佛教思想所帶來的影響。以此為嚆矢，使得南北朝時期的十三宗，到了盛唐時期融合成八宗，使諸宗派進入新的統合。對湛然而言，一方面繼承天台教學之祖說，一方面又面臨玄奘所帶來新譯思想之衝擊。新譯經典未見於智顛時代，因此，湛然如何受容，此正是被揚譽為天台中興教祖的湛然無法漠視也是必須解決的課題。此亦是唐代天台學的特質之一。

玄奘新譯所帶來天台教相上的衝擊，以及解明天台教學中對新譯思想受容問題，《問論》是不可欠缺的重要資料。就時代意義而言，《問論》正是反應着舊譯與新譯衝擊的重要著作，亦是解明法相與天台兩教學差異之要書。

《問論》作為中國古德之撰作，其校釋書何故却納入日籍佛教科籍叢刊？因本論佚於會昌五年（八四五）之廢佛事件，其得以流傳至今，全賴日僧保存。

首先，於理解《問論》之前，對其之論破對象——《玄贊》，有先行概括了解的必要，適當、正確地了解《玄贊》，將有助於理解《問論》的立場性。

（一）《玄贊》特色，天台批判說始末，以及研究簡史

窺基撰《玄贊》十卷，全稱《妙法蓮華經玄贊》，是為羅什譯《妙法蓮華經》（以下稱《法華經》）之注釋書。此書以唯識學之立場解釋《法華經》是其最大特色。書中依據無著、世親等所撰《攝大乘論》、《瑜伽師地論》等說，展開《法華經》釋。其中尤以世親之《法華經論》反復引用甚多，并企圖以世親《法華經論》檢校羅什《法華經》譯本之缺失。有關窺基的詮釋意圖，長期以來以鑽研唯識、法華二領域為主要研究的學者勝呂信靜，對此有深刻之洞見，其論道：「《玄贊》的意義，在於對《法華經》提示唯識教學的解釋，甚至比世親的《法華經論》更加徹底地貫徹唯識學說的立場。」甚至指出：「窺基的理解，把《法華經論》的思想，限定成狹義唯識說，是最大的問題點所在。」<sup>〔一〕</sup>

因此，基於這種強烈顯現唯識立場的企圖性，窺基是否是為了更逼近《法華經》的要義或精神而撰

作注釋本呢？頗值得吾人深思。中村元則曾關注到此一問題，說到：「窺基雖然對照過當時可能尚存的《添品法華》諸多梵本，而且對梵文的理解，縱使有不解之處，隨時可從其師玄奘三藏獲得解答。但是有關思想理解點上，慈恩大師對《法華經》的理解，遠遠不如完全沒有參照過梵典的天台大師。」<sup>[1]</sup>這一點也正是湛然撰作《問論》的立場所在。

此書訓詁學占相當比例亦為其另一特色。書中廣泛運用《說文》、《玉篇》、《切韻》、《三蒼》、《蒼頡》、《廣雅》、《爾雅》等訓詁學相關書籍。此當與窺基列席譯場重視訓詁學的學經背景有關，窺基擅長訓詁學，另可從其撰《法華音訓》、《法華經為為章》窺知。

另外，在敦煌文物中發現《玄贊》寫本計有十餘種，分別有斯坦因本、伯希和本、北京藏本等<sup>[2]</sup>。同一著作留傳多部寫本，顯示其流行與興盛程度，值得吾人注目。除了上述漢文寫本以外，亦有維吾爾語譯寫本殘片一點<sup>[3]</sup>，亦有藏文譯本，題為《妙法蓮華註》，收錄於西藏大藏經。從其流傳本知其頗見重於西域。

其注釋書有弟子慧沼（六五一—七一四）《法華玄贊義決》一卷，慧沼門弟智周（六六八—七二三）《法華玄贊攝釋》四卷，唐崇俊述、法清集疏《法華玄贊決擇記》八卷，唐栖復集《法華經玄贊要集》三十五卷，唐可周《法華經玄贊釋》一卷，唐清素撰《法華玄贊記》四卷（已佚）。又，伯希和所盜取的敦煌遺書中有明詮《妙法蓮華經玄贊科文》卷二（未完草稿二首）（P.二一五九〇）。另外，一九七四年山西省應縣佛宮寺木塔發現的契丹藏中，有註明所注《法華經玄贊會古通今新抄》的《玄贊》相關注疏<sup>[4]</sup>。

日本學者布施浩岳在《玄贊》解題中，提出「窺基對天台有濃厚的對抗意識」<sup>[5]</sup>，是為近世《玄贊》天



台批判說之發端。繼之安藤俊雄雖已見端倪而道：「《玄贊》書中對天台學說的批判，并不是非常露骨。」<sup>(七)</sup>但最後仍繼續支持對抗天台說。其原因在於二氏都是基於天台實相學與法相唯識學根本立場相違為前提，從教義的理解上所作的判斷。然此等論斷，確實是太過於牽強附會。

早在一九二九年，島地大等就已提出「在慈恩眼中恐怕從未有天台法華教學」<sup>(八)</sup>之論見，方不失正鵠。校者通過全面性精讀《玄贊》的結果，亦可斷定窺基幾乎無視於天台教學的存在。

最後，在日本學界為《玄贊》的天台對抗說畫下休止符的是末光愛正。其透過詳細文獻比對，反對前述布施氏的論點，並認為《玄贊》對天台的對抗意識非常薄弱。《玄贊》中僅出現一次「顛師云」，也是援用吉藏的《法華義疏》，並提出其批判對象正是吉藏<sup>(九)</sup>。繼末光氏之說，三論權威學者平井俊榮，再經比對研究也證實《玄贊》中多處引用《法華義疏》的事實<sup>(一〇)</sup>。據校者的研究調查，《玄贊》的批判天台說，當可溯源至慈雲遵式(九六四—一〇三二)(一一)。

引發上述議論與天台對抗說的種種臆測，歸根究底在於《玄贊》引用前人著作，却未說明出處。《玄贊》中雖廣泛引用經典，但除了窺基自己撰述的《上生疏》、《無垢稱經疏》以外，從未出示任何一部中國撰述的注釋書。從其引用而言，中國撰述祇能看到吉藏的《法華義疏》，但却未示出處，書中以「古說」、「彼說」、「古德」、「古解」、「古有解云」暗指吉藏。故其受吉藏影響相當深刻是無庸置疑的。

事實上，《玄贊》與吉藏《法華義疏》的引用關係，以及書中直接承襲吉藏之說，最早發現此一情形的便是湛然。有關這一點，湛然在《問論》中嚴厲斥責，如卷上第一九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有明稽古者可憑。何以依嘉祥而隱其名？」在卷上第二八問，也說到：「所用嘉祥，何惜少許言及疏

主？」湛然已一語道破《玄贊》引用吉藏却未說明的事實。上述諸等紛紜，除了引發吾人文獻比對研究之深省，亦更凸顯湛然《問論》在唐代法華學研究上的重要性。

## (二)《問論》特色與撰述形態

湛然撰《法華五百問論》三卷，又稱《五百問論》、《五百門論》、《釋疑》，此等名稱見載於東大寺古寫本，又圓珍《八一四〇八九一》對此書則另稱「決疑」。書中以天台教學之立場一一斥難《玄贊》中之法相學說。二宗見解之相違，源於二宗所依經論系統不同之故。主要問題環繞着一性皆成與五性各別立場的相異所展開的定性種姓成佛不成佛等一系列之論爭。

本論著作背景，事緣於乾元至 upper 元年間（七五八—七六二），為講述《法華文句記》（以下稱《文句記》）所撰作。對湛然而言，《玄贊》是當時《法華》注釋書的最新研究成果，由於《文句記》撰作上的需要，關注與參考《玄贊》是非常必要而自然之事。因而將其發現之問題依序地寫下備忘錄。由於是簡易的備忘錄，故嚴格而言，《問論》不能算是一本注釋書，因為書中雖有設問，但未必有解答，且大致都是簡略的文章。這種敘述形態也是湛然其他著作所未見的。

全書采問答形式，逐次問難《玄贊》，共計三九八問。書中首先提出問題，針對這個問題，以《玄贊》的解釋作答，接着，以「今謂」說示湛然自己的見解與立場（二）。文章表現的樣式，大致上以此基本形態展開每一條問題。書中另亦有以「又問」、「今問」、「今亦問」、「今復問」、「今還問言」提出湛然之見。但主要以「今謂」展開湛然的評論，是為基本形態。

因此，所有的問條均依《玄贊》順序，逐次立問。簡單問條的情況，僅一問、一答、一今謂。也有於「今謂」陳述見解後，又以「又曰」、「又云」<sup>(三)</sup>再次出示《玄贊》的解釋，接着再以「今謂」提出見解。如卷中第一四問一問之中，即出現「今謂」十四次。

故每一問條，首次出現的「問」，是湛然對《玄贊》的解釋所提出之疑問而設立。首次出現的「答」，是《玄贊》對《法華經》文的注釋，或引用他論作釋等。「今謂」，則是湛然以天台學的立場提出贊文注釋的問題所在。故「問」與「答」皆為《玄贊》的引文，也是窺基以法相宗的立場詮釋《法華經》。當然也是湛然視為問題點之所在，並作為欲論破之關鍵點。

故「今謂」、「又云」是區別窺基或湛然見解的重要標示，但文中此等用詞諸多省略。在未能與《玄贊》對讀的情形下，事實上根本無法辨識為何者之見。因此，本書加補右標小字的方式，補足「今謂」、「又云」脫落的問題，並以嚴密的分段，進一步改進這一方面的研讀難題。使《問論》不經對讀《玄贊》，仍然可以清楚地畢見二師之見。

## 二、《問論》真偽說始末

有關《問論》是否為湛然真撰的問題，首先見載於《台宗問目二十七條》。事由日僧源信（九四二—一〇一七）於其弟子寂昭入宋之際（咸平六年〔一〇〇三〕），作問二十七條委付寂昭，向四明知禮（九六〇—一〇二八）請求答釋<sup>(四)</sup>。此二十七條問，反映當時日本天台宗對天台教門議論的諸問題。其中

第二十七問，問及有關《問論》的真偽性，此正是真偽說之嚆矢。源信感於《問論》內容訛謬太多，若為湛然大師之撰，內容不可能有不能貫通的情形，因而尋求知禮為其解惑。面對此一問題的知禮，以「宋地闕本」回應而無法解開源信的疑團<sup>〔一五〕</sup>。

產生《問論》偽撰說的主要原因，根據校者詳細調查文獻結果，可歸納為三點：（一）備忘錄之撰述性質不為天台後世僧所重，（二）中國史料之闕如，（三）未見載於遺唐僧最澄與圓珍之將來錄。<sup>〔一六〕</sup>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作為保存書籍重要手段的大藏經、章疏目錄未見記載等，則是《問論》在中國長期消失的另一遠因。但無法改變以上諸狀況的關鍵性之史實，則是發生於唐武宗會昌五年（八四五）的廢佛事件。從《問論》完成的乾元（上元年間）七五八～七六二至會昌五年（八四五）廢佛事件為止，祇相隔約八十餘年的歲月。換言之，《問論》在中國完成後不久便完全消失。

以至於在後世遵式、宗鑑、志磐、對窺基《玄贊》毫不留情地批判下<sup>〔一七〕</sup>，對於湛然曾經對《玄贊》抱持種種疑問而撰作的《問論》，未曾提及隻字片語。很顯然地，宋天台僧對《問論》可能是毫不知情。因此知禮回答源信第二十七問時，很有可能是首次知道《問論》的存在。這種情形，與其在中國迅速消失不無關係。

會昌廢佛雖是《問論》在中國消失的主要關鍵，然其未受後世天台僧重視的理由，乃是其相關思想——唯識不為後世天台僧所重，也是本論在中國消失的一大遠因。

這種情形相當程度反映當時中國南地佛教界的普遍現象，具體的實例可從源信《台宗問目》二十七條的《第二十二問窺知消息》。此中源信問及有關《婆娑論》新舊兩譯的問題，四明知禮却以《婆娑》新

舊未暇檢〔二〇〕作答。由此可知源信與知禮兩者，對法相學關心程度的差異。

有關南北佛教差異的現象，入宋僧成尋（一〇一一—一〇八一）《參天台五臺山記》記載有關南北兩地唯識學隆盛程度對比的實例。書卷六記載了北方多學慈恩宗〔一九〕。同書卷七，成尋亦記載了北地無天台僧人的跡迹，北地高僧中屬華嚴宗、律宗、慈恩宗者多〔二〇〕。

成尋入宋時代，正當遼、宋對峙期間，由於戰略的需要，對於書籍的互通有非常嚴苛的禁令。故政治要素、政治策略阻隔文物與思想的交流，間接深化南北地域的隔差，使得身處南方的天台僧未予關注與法相教學關係甚深之《問論》，亦為本論在中國消失的另一遠因。

### 三、《問論》在日流傳實況

本論佚於會昌五年（八四五）之廢佛事件，却在日本保存下來，是由日僧圓載於會昌三年（八四三）托付日僧仁好携入日本以來，直到正續藏經（一九一二）的公刊問世為止，長期消失於中國的《問論》，却在日本有過兩次的盛傳期，其一是平安時代，其二是江戶時代〔二一〕。

本校釋書作為底本的《五百問論箋註》（本書略稱箋本）是江戶時代本純（一七〇二—一七六九）所撰，亦為《問論》唯一的注解書，由校者於京都大學圖書館所尋得的江戶時代刊本。本書作為第一校本的古寫本，為日本奈良東大寺圖書館所藏，并由校者自行出資，通過照相影印取得全書影印本，此書為日本鎌倉時代東大寺僧宗性於永文九年（一二七二）所完成的寫本，是《問論》唯一現存的古寫本，為所

有傳本中年代最久，也是保存狀況最良好的本子。

日本章疏目錄中記載《問論》者，據校者調查結果，共計有十二筆，依年代列示如次。玄日（九一四撰）《天台宗章疏》、空慧（九二五撰）《山王院藏》、永超（一〇九四撰）《東域傳燈目錄》、未詳撰者（一一七五）一、一八〇撰）《古聖教目錄》、未詳撰者（平安末期撰）《一切經論律章疏集（傳錄）并私記卷上》、未詳撰者（一二三七）一二七二推定）《大唐國法華宗章疏錄》、未詳撰者（一五四八）一六六七以前）《諸師製作目錄》、未詳撰者（一五四八）一六六七）《釋教諸師製作目錄》、公海（一六五四撰）《山門藏本目錄》、鳳潭（一六五四）一七二八撰）《扶桑藏外現存目錄》、謙順（一七九〇撰）《諸宗章疏錄》、興隆（一七九六撰）《佛典疏鈔目錄》。(三三)

傳本的流傳與版本的開雕、印行，是為書籍保存的重要手段。校者實地調查的結果，現存《問論》版本計有十種本得到確認。詳細依年代順序說明如次。① 東大寺藏古寫本（東大寺圖書館），是為本書第一校本，本書略稱東本。② 真如藏書本，木活字版（叡山文庫）。③ 天海藏書古寫本（叡山文庫）。④ 西教寺內所藏舜興藏本，木活字版（正教藏文庫），是為本書第二校本，本書略稱正教本。⑤ 日光文庫藏本。⑥ 龍谷大學藏本。⑦ 大正大學藏本，是為本書第二校本，本書略稱正大本。⑧ 立正大學藏本。⑨ 《五百問論箋註》，是為本書底本，本書略稱箋本。另，大谷大學、京都大學、大正大學、叡山文庫各有所藏。⑩ 《大日本續藏經》（以下稱卍本）。(三四)

綜上所考，雖得十種版本，但其系統祇有六種，以下保留上述序號製以簡表，將六種系統歸納如次。

現存《問論》版本所藏處與版本系列一覽表

系列	序號	所藏處	年 代	寫 / 刊本	備 注
(一)	①	東大寺	文永九年(一二七二)	古寫本	
	②	叡山文庫	寬永十二年(一六三五)	木活字版	一紙十二行, 一行二十字
(二)	④	西教寺	慶安四年(一六五二)	木活字版	一紙十二行, 一行二十字
	⑤	日光文庫		木活字版	
(三)	⑥	龍谷大學	刊記年代未詳	整版	一紙十一行, 一行二十字
	⑦	大正大學	刊記年代未詳	整版	一紙十一行, 一行二十字
	⑧	立正大學	刊記年代未詳	整版	一紙十一行, 一行二十字
(四)	③	叡山文庫	慶長十二年(一六〇七)~一六四二	古寫本	
(五)	⑨	箋本	寬政七年(一七九五)	刊本	有問條數
(六)	⑩	刊本	一九〇五~一九二二	大藏經	有問條數

另, 有關版本諸問題, 見本書後附錄「《問論》版本考記」。

〔一〕 勝呂信靜《窺基の法華玄贊における法華經解釋》三四四頁、三四八頁（坂本幸男編《法華經の中國的展開》所收，平樂寺書店，一九七二年）。

另，中村瑞隆亦有相同論見。文出中村瑞隆《西藏譯正法蓮華註と法華玄贊に見られる三草二木喩》六九八頁（同前書所收）。

〔二〕 中村元選集第二卷《東洋人の思惟方法》七頁（春秋社，一九六一年）。

就校者所考，窺基在《玄贊》中確實自述曾向師玄奘詢問梵文字義。

《玄贊》卷一《序品》：「曾問先師慈音妙大雲義，大師勘梵本既具此頌，正云梅怛刺耶末那，應言慈意，非慈音也。」《大正藏》三四冊，六六〇頁。

〔三〕 上山大峻《唐代佛典の西域流傳の一面——法華玄贊の出土寫本をめぐって——》四五六頁。（唐代史研究會編

《隋唐帝國と東アジア世界》所收，汲古書院，一九七九年）

〔四〕 有關維吾爾語譯寫本，到底是不是《玄贊》？學者意見仍有分歧。因僅剩殘片，難以全盤性得到解決，但大致上皆判定是《玄贊》的抄譯。年代大致與敦煌寫本同一時期，為八、九世紀。維吾爾語譯本、藏文譯本都是受敦煌佛教的影響。參前揭上山大峻論文四六四頁～四六五頁。

〔五〕 竺沙雅章《宋元佛教の南北問題——慈恩宗の系譜——》《日本歷史學協會年報》創刊號，一九八六年）二頁。有關

「註明抄」，成尋（一〇一一～一〇八一）也說此書是《玄贊》的釋書。《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云：「由給以契丹僧作註明抄，釋玄贊書也者。」（《大日本佛教全書》第一一五冊，二二八頁）

〔六〕 布施浩岳《妙法蓮華經玄贊解題》《國譯一切經經疏部四，一九三七年）。

〔七〕 安藤俊雄《天台性具思想論》《法藏館，一九五三年）九七頁。



〔八〕 島地大等《天台教學史》，初版，一九二九年，明治書院；複刻版，一九七六年，中山書房；一九八七年再由中村元等編《現代佛教名著全集》收錄，隆文館出版。

〔九〕 末光愛正《法華玄贊》と《法華義疏》《曹洞宗研究員研究生研究紀要》第一七號，一九八六年）三一頁～三八頁有詳細比對。

〔一〇〕 平井俊榮《法華玄論の註釋的研究》春秋社，一九八七年）一一三頁～一一四頁。

〔一一〕 有關違式的誤認，比對論證詳見拙著吳鴻燕《釋真定》《湛然〈法華五百問論〉の研究》第四部第一章第二節二〇九～二一七頁。（東京：山喜房佛書林，二〇〇七年）。

〔一二〕 湛然以「今謂」、「今問」、「又問」開陳自己的見解與評論。然有三處特例，卷上第一〇問：「今謂乍觀可爾」，卷中第一三五問：「今謂不然」，卷中第一四一問：「今謂諸妨已如前問」。此三處「今謂」以下仍是引述《玄贊》文，非為湛然見解。

另，校者博士論文（前出拙著六九頁），當時的研究報告，「今謂」特例僅一例卷中第一三五問。經此校釋撰作再次詳對的機緣，得以更新前次研究報告。

〔一三〕 「又云」、「又曰」，均為陳述《玄贊》文。然亦有特例兩處，「又云」以下是湛然見解與評論。卷上第八六問「又曰：除初地外除無信者」，卷上第九五問「又曰三六」等文，為湛然之評論。內文有詳注，在此說明省略。

〔一四〕 《四明教行錄》：「皇宋咸平六年（一〇〇三）癸卯歲，日本國僧（寂照）等齋到。彼國天台山源信禪師於天台教門，致相違問目二十七條。四明傳教沙門（知禮）憑教略答。《大正藏》四六冊，八八五頁中。

〔一五〕 《四明教行錄》二十七問：《五百問論》題下，云妙樂大師造。疑者云：「此論似多訛謬。」且舉一二，如……若是大師所製，不可不通。答：此論宋地闕本，茲不得而評論矣。《大正藏》四六冊，八八九頁下。